

刘国光文集

第三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刘国光文集

第三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目 录

- 1 国民经济良性循环问题**
——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会议上的发言摘要（1981年9月16日）
- 15 关于再生产理论的研讨与述评（1981年）**
- 26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重要问题（1981年10月）**
- 51 关于研究和讨论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一点想法**
——在经济研究中心计划与市场问题协作组座谈会上的发言（1981年10月23日）
- 57 谈谈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几个问题**
——在北京协作区政治经济学教员集训班上的讲演摘录（1981年10月29日）
- 80 关于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几个问题（1981年11月）**
- 101 研究改革经验 探索改革模式**
——在经济研究中心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1981年11月21日）
- 113 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中的两个关系（1981年）**
- 128 关于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的几个问题（1982年1月）**
- 161 要提高计划的权威性 首先要加强计划的科学性**
——在孙治方同志主持的学习陈云同志春节重要讲话的座谈会上的发言（1982年1月29日）

- 165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1982年2月)
- 218 访苏印象和中国经济
——对苏中友协讲稿 (1982年4月)
- 223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 (1982年4月)
- 231 不要回到已摒弃的老观念上去 (1982年7月)
- 235 苏联经济体制改革情况和问题
——在云南省工业经济管理师资、干部培训班所作的专题
讲课 (1982年8月23日)
- 267 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1982年9月6日)
- 278 关于苏联经济管理体制的考察报告 (1982年10月)
- 306 本世纪末中国经济发展的总的奋斗目标 (1982年11月)
- 314 学习十二大文件发言摘要 (1982年12月)
- 318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讲演记录 (1983年3月
31日)
- 362 在全国投入产出法应用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 (1983年
5月)
- 371 进一步深入开展对苏联经济问题的研究
——在苏联经济理论讨论会上的讲话 (1983年7月14日)
- 381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些问题 (1983年8月21日)
- 392 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 (1983年8月)
- 405 孙冶方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几个问题 (1983年8月)
- 431 再论买方市场 (1983年9月)
- 452 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 (1983年末至1984
年初)
- 480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 (1984年1月)
- 525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计划与市场问题 (1984年1月)

- 546** 对“七五”计划指导思想的几点意见
——在物价改革座谈会上的发言（1984年2月11日）
- 552** 要处理好几件大事的关系
——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1984年2月16日）
- 562** 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
——在美国华盛顿世界银行经济研究所的讲演稿（1984年3月）
- 578** 关于经济体制的模式问题
——在国家体改委举办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班的讲课
（1984年5月3日）

国民经济良性循环问题

——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1981年9月16日)

我同意暮桥同志发言中提出的题目和发言的基本精神。现就“关于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问题”谈几点意见。

一、关于国民经济循环的基本概念

1. 什么是国民经济循环？经典著作中没有出现过。我们所讲的国民经济循环，实际上是社会再生产不断运行、周而复始的过程。

(1) 这个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流通）、消费四个环节。生产是起点，生产的产品经过分配、交换即流通，最后用于消费。消费是一次循环的终点，又是下一次循环的起点，因为它对生产提出了新的需要。

(2) 这种循环，分为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两者又是相互交叉进行的。

(3) 在这个国民经济大循环中，还包含着许许多多局部的循环，如各个部门之间和部门内部的循环。社会生产的各个要素，包括人、财、物也各有其循环。局部性的循环，都从属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循环，同时又对后者起着制约的作用。

这些循环，表现为相互联系的投入、产出，再投入、再产出，关系错综复杂。同时，经济的循环不是重复，而是螺旋式的循环，即在简单再生产基础上的扩大再生产。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循环，国民经济得到发展，经济结构起着变化。

2. 良性循环和不良循环的区别标志是什么？

各种经济制度都有它不同的经济循环规律。资本主义不仅存在着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使整个生产过程处于无政府状态，而且生产的不是直接为了消费，各个环节不能经常保持按比例，相互脱节，必然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循环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计划规律是主导作用，并且生产目的是为了消费需要，就有可能促进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取得稳定增长的较高速度。但是，要把可能变为现实，取决于多种多样的主客观条件，特别是能否真正按照社会主义的诸经济规律办事。如果指导思想脱离实际，战略目标有偏差，管理体制不完备，计划安排失误，就会造成循环失灵。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当有可能出现良性循环，但也有可能出现不良循环，甚至恶性循环。恶性循环往往导致经济危机。当然，社会主义经济中可能出现的恶性循环与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社会主义经济的良性循环，从社会再生产运动来看，就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能够协调地、有效地运转，从而社会生产不断扩大，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用综合平衡的术语来说，就是国民经济在合理的比例和良好的效果的基础上，取得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持续稳定的发展速度。这也就是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时间节约规律的要求。

社会主义的良性循环同不良循环的区别，能否归纳为以下四个标志：

(1) 在比例关系上：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和部门内部保持大体协调的比例关系，相互衔接而不是相互脱节，保证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也协调发展，顺利实现不断扩大的再生产。

(2) 在经济效率上：整个经济运动能够做到以较少的劳动消耗和资金占用获得较好的经济效果。

(3) 在发展速度上：良性循环体现为有持续的稳定的而不是大起大伏的增长速度。

(4) 在生产目的上：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不断得到改善。

在良性循环的情况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也是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牵制，环环相扣而不相互障碍。生产——适销对路，物美价廉，两大部类比例恰当；分配——三者利益兼顾，积累和消费份额合理；交换或流通——渠道多，环节少，周转快，供求基本平衡；消费——不断提高，同时创造新的需要。

3. 不良循环的表现和造成的原因。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曾经有过良性循环（1952—1957年），也有过不良循环（1958—1962年），还有过由不良循环恢复为良性循环（1963—1965年）。“文化大革命”十几年，又一次出现了不良循环。这些不良循环，共同的特征是所谓“两高”（高指标、高积累）、“两低”（低效果、低消费）。它的产生过程是：

(1) 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不顾国情，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速度，定出无法达到的高指标。

(2) 为了实现高指标，盲目扩大基本建设，尽量提高积累基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形成高积累。

(3) 由于积累过高，严重地破坏了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加

上经营管理差，损失浪费大，经济效率和经济效果很低。

(4) 高积累挤了消费基金，低效率浪费了社会财富，人民生活受到影响，消费水平也低。

本来，真正实现了按比例的高速度，应当有可能取得高消费的结果。但是，目的不明，比例失调，损失严重，只能是欲速不达。不仅消费低，而且速度也不能不低下来。不良循环，于是表现为高速度——低速度的循环，即大起大落的循环。一时的大起，往往以加倍的大落为代价。1958年以来，三个大起大落（包括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次），都是以片面追求高速度开始，以比例失调而低速度或负速度告终；而在每一次调整、回升后，又一次追求高速度，再一次陷于不良循环。这些经济战线上左倾错误的突出表现，是必须永远记取的沉痛教训。

总的来说，过去曾经出现不良循环，原因很多，总根子是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速度的指导思想。在此指导思想下，主要有两条：

(1) 不讲比例关系，特别是不讲比例和速度的关系，不讲积累和消费、两大部类以及人、财、物之间的平衡。

(2) 不讲经济效果，特别是只图虚名，不讲实效，不讲国民经济核算和企业核算，不讲宏观的和微观的经济效果。

二、对当前国民经济循环处于什么状况的看法

三中全会确定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不仅解决当前问题，并且着眼于未来，也可以说是为了彻底扭转不良循环，争取走向良性循环。两年多来，成绩显著，“两高”、“两低”开始改变。

(一) 高指标取消了。制定计划开始注意实事求是，留有余

地，能增则增，该减就减。这是过去没有过的，也是扭转不良循环的前提。1979、1980年两年，农业增长不慢，工业也有增长，每年在8%以上，但比过去每年平均增长在10%以上（一般为11%—13%），似乎相形见绌。今年（1981年）进一步调整，工业速度下调幅度又较大，这就引起了不同看法。我们认为，除了过去统计上有虚假（废品、次品和积压产品都计产值）外，在经济调整中，降低速度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要理直气壮地给予肯定。因为只有降低过高的速度，才能调整比例，提高效果，这是变不良循环为良性循环的客观要求。1981年工业速度，特别是重工业速度降低较大，这是我们争取时间、创造条件、求得今后良性循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再有否定、怀疑和动摇。

（二）高积累下来了。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投资总额有所降低，是几年来的一大转变。据统计，全国基建投资，1979年500亿元，比1978年增加20亿元；1980年540亿元，又有扩大；但1981年紧缩到300亿元，加上计划外的，可能有400亿元，或更多一些。1981年上半年完成基本建设投资额比1980年同期下降21.9%。积累率1978年是36.6%，1979年是34.6%，1980年降为32.6%，1981年将进一步降低。虽然仍旧偏高，但是毕竟有所降低。

（三）低消费改善了。调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调整工资，使社会商品购买力大幅度上升，虽然不能完全兑现（可供商品量的缺口，1979年为173亿元，1980年又增33亿元，1981年可能进一步扩大），但是兑现部分总有增长（扣去物价因素），使绝大多数的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问题是“两高”、“两低”中的“低效果”改变不大，有的还有倒退。据了解，每百元积累新增国民收入，1979年和1980

年都只有20元多一些，1981年大致也是20元左右，比1957年还少10元以上。产值利润率、资金利润率比1957年也低得多。很多经济指标没有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产品质量低，成本高，资金占用多，投资利用差等情况依然普遍。这是当前影响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和转向良性循环的一个最大的症结。

总的看来，“两高”、“两低”中的已有“两高”“一低”起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能不能说，长期以来形成的不良循环已经得到遏制或开始扭转，当然，这不能说已经完全摆脱了不良循环的困境，更不能说已经达到良性循环的要求。除了上面所述积累率还偏高和消费基金不能全部兑现以及经济效果未有好转外，能源和交通运输的紧张卡住了脖子（1981年1—8月比1980年同期，原油和发电量分别增长0.4%和0.6%，原煤下降0.3%），近期不会有太大转变，对生产、建设都是制约。同时，在调整的过程中，当前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下述两点：

1. 重工业生产速度缓慢。1981年1—8月，工业总产值比1980年同期只增长1%，虽然轻工业增长12%，但是重工业下降8.2%，增长速度出现较大幅度的负数。尤其是机械、冶金工业下降更大。

2. 财政收入没有增长。1981年上半年财政收入比1980年同期减少14.4亿元。虽然税收增长23.9亿元，但是企业上缴利润减少40.2亿元；其中重工业减产减收，轻工业增产减收，亏损单位扩大到31.5%，亏损额上升55.7%。财政在大量紧缩开支以后，上半年有结余，但是还难做到完全平衡，尤其是即使1981年基本平衡，今后仍可能再度出现较大的赤字。这与经济良性循环的要求距离很大。

由于重工业生产下降和财政收入下降，有的同志提出，是否已经出现了新的经济萎缩的不良循环？还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今年

(1981年)调整带来的后果。对这些问题,我们的看法是:

1. 有些现象是调整中难免的,也在预料之中。调整就是有进有退,退是为了更好的进。以机械工业为代表的重工业本来发展超过需要,属于长线,调整中会有一部分吃不饱,应该进行关停并转。当前机床利用率不到50%,有的设备十分落后,不可能也不应当全部运转起来。不良循环的形成有长期的原因,改变这种状况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调整有个过程,在此过程中,某些损失也是难免的。当然,我们要尽量减少调整中的损失。

2. 调整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是有没有某些方面过了头?例如对调整,前两年是慢慢来,特别在压缩基本建设路线上按兵不动,增加了国民经济的困难,这是不对的,去年(1980年)年底中央决定采取坚决措施,实行进一步的调整,这是完全必要的。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1981年在减少财政赤字、回笼货币和稳定物价上,已经取得成效,如果不是采取坚决紧缩政策,上半年物价只增长0.7%是绝对打不住的,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在肯定进一步调整的大方向完全正确的同时,采取急刹车的做法,在方法和步骤上是否有不妥的地方?例如急刹车的办法对整个经济产生突然震动,容易出现“一刀切”,由于准备不够而造成某些混乱,增加不必要的损失。这次压缩基本建设,虽有该下的未下,也有不该下的下了(例如某些短线产品,技术改造、节约能源的在建项目,已有设备,继续花少量投资就能利用,但限于控制数字,不得不列入停缓建)。又如,扩大消费基金,有的可能过多,例如农副产品提价的幅度大了,奖金失去控制,今年上半年工资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9.4%,而劳动生产率却比上年同期下降了5.4%。

3. 改革的大方向也是对的,但是缺少总体规划,互不配套,加上整顿提高抓得不够,不少政策措施未能取得预期成效。例如

没有打破部门所有制和地方所有制，使企业改组难以进行；“分灶吃饭”，进一步助长了重复建设和盲目生产，没有改革物价体系，价格不合理越来越严重，使企业扩权后苦乐不均十分悬殊；有的大利大干，小利不干，使长线产品越来越长，短线产品不易增产。“低效果”改进不大，与此有关，这是影响财政收入的一个重大因素。

4. 有的同志提出，当前是否已经出现了另一种经济萎缩的不良循环？我们认为，现在农业、轻工业增长较快，人民生活逐步改善，这些方面必须肯定，整个国民经济形势是在好转中，从全面来看并不能说已经出现新的经济萎缩性的不良循环。当然，重工业生产下降和财政收入下降，是在形势好转中有待解决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长此以往，到一定程度，不是不可能出现新的不良循环的。这种新的不良循环，会阻碍整个国民经济从不良循环向良性循环的转化。这是因为：（1）从长期看，要有一定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长，有上限，超过了就是高指标；也有下限，太低了使原有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得不到充分利用，还对人民生活的改善和财政收支等会产生不利影响。（2）财政收入长期停留于较低水平，也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循环）：财政收入不增加—财政支出不增加—生产建设增长放慢—财政收入更难增加。（3）基本建设同样如此，有上限，也有下限，低于这个下限就会影响一部分固定资产的简单再生产，即现有企业的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会使生产性固定资产的增长和劳动力的增长不适应，从而影响就业；还限制投资生产资料（设备、建筑材料）的增产，造成生产能力和劳动力的闲置和产品积压。（4）当前农业、轻工业增产而重工业减产，调整了生产比例。但是如果长期下去，形成新的剪刀差，差距越来越大，到一定程度，重工业就会束缚着农业、轻工业的继续增产；因为农业、轻工业的发展

也有赖于重工业提供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包括能源、化肥、轻工原料和各种技术装备。这些，都是经济循环的具体内容，应当做到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牵制，才能从不良循环向良性循环转化。

三、怎样尽快实现良性循环的几点意见

总的讲还是要靠全面贯彻八字方针。这里谈几点看法。

1. 速度和效果的问题。当前我们面临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速度大幅度下降，和由于速度下降和效果提不高而带来的财政收入下降的问题。面临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强调什么，强调提高速度还是强调提高效果？我同意暮桥同志上次所讲的精神，“‘六五’保持较低的速度，目的在于提高效果，低速度高效率应该是‘六五’的战略方针”。我体会这句话的精神就是强调提高效率而不是强调速度。我觉得这是对的，但不一定用“低速度”的字样。因为“六五”3%—4%的速度是否低，看同什么比。鉴于过去我们吃片面追求速度的亏太多，不良循环、恶性循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因此摆脱不良循环或恶性循环，以及从不良循环向良性循环转化，首要的前提就是不能在速度上着急，而要在效果上下功夫。但这句话讲起来容易，实际上不容易。看到我们落后，我们大家都想快一点。有的同志看到十年“文化大革命”时的速度比三中全会后的平均速度高，就坐不住，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是不可比的。效果、生活都不可比，那时的速度是虚的，现在的速度是实的，而且现在的调速是过去追求高速逼得我们不得不调整才发生的，所以不能比。

根据过去的经验，短期内要使速度上去，不是办不到的，而且不难办到，只要一号召，或者向下面暗示一下，下面追求产值

和速度的办法多得很，生产一大堆销不掉的东西在仓库里，速度也能出来；拼设备，速度也能出来。但这种速度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我们的教训太多了，造成的损失太大了。所以我同意“六五”不要强调速度，应该强调效果。宣传上也应如此。浙江工作确实不错，但报纸宣传全国工业产值增长速度它是第一，这不必要，应该宣传它怎样提高经济效果。我觉得强调速度，宣传速度，恐怕又要出老毛病。一定靠抓效果。这才是转向良性循环的根本、关键。

2. 怎样提高“六五”期间的经济效果？经济效果有宏观效果、微观效果。宏观效果的提高主要靠调整比例关系和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使经济循环舒畅；微观效果的提高主要靠经济体制改革，使人们的积极性提高。这里只讲一点，即在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时投资重点怎么确定的问题。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宏观效果的问题。在调整经济比例中，由于过去不良循环形成的薄弱环节、短线部门很多。先后提出的发展的不同重点，如消费品生产、能源、交通、企业设备更新、技术改造、人才开发和人力投资（科教），等等。从每个方面看都有道理，都非常重要。但是当前国民经济的资金、物资只那么多，不能都成重点。否则，结果或者形成撒胡椒面，一样也干不成，或者又走高积累的老路。这当然是我们要避免的。我认为，从提高国民经济的效果出发，除了消费品生产必须搞上去外，发展重点首先应当放在现有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上，投资重点放在这方面的好处很多：一是对现有的陈旧的、年久失修、带病运转的很大的技术设备，进行更新改造，花钱不多，但将会提高国民经济面上的经济效率。二是不但直接与节约能源有关的技术改造，如锅炉改造、发电供热等等，而且节约原材料，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更新改造，有许多也能间接节约能源，可以大大减轻对能源的压力，使我们在

“六五”期间有可能通过以节能为主的途径解决能源问题。三是由于外延性投资的收缩而下降的机械工业和整个重工业，将会由内涵性的扩大再生产和简单再生产的补偿任务的落实而获得广大的市场，闲置的设备和人力将得到利用，应该说目前机械工业、重工业下降的原因与其说主要由于外延性基建投资下降，不如说主要是由于使简单再生产的补偿和内涵扩大再生产结合在一起的老企业更新改造没有及时抓上去，以及以机械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内部结构没有及时相应地转向为现有工业更新改造服务的轨道上去造成的。四是现有企业的更新改造带来的重工业生产的回升和各部门经济效率的提高，将大大有利于财政收入的增长。所以我同意暮桥同志发言中讲的“五年十年内使原有企业设备更新改造是使国民经济转向良性循环的最主要的环节”这个提法。我认为从中央领导同志讲的两个“向前（钱）看”来说，这个提法都是合理的。所说的向“钱”看，我体会是从近期的经济效果看，收效快，可以较快地增加财政收入，缓和财政的紧张；所说的向前看，是指远期的经济效果，经过改造的现有企业将会在比较长时期发挥效益，提供更多的积累，实际上是真正为“七五”和1990年以后的大发展积蓄可靠的力量。所以仅仅把加强能源和交通的投资看成是向前（“七五”及以后）看，是不够的。当然，这方面确实需要以利用低息的外资作点准备工作。但如果这方面占用国内资金过多，如占三分之一或更多，以致妨碍收效快和影响现有企业的更新改造，我觉得不但对近期发展的“向前看”，而且对较远期发展的“向前看”，都不一定有利。所以明确现有企业更新改造是转向良性循环的最主要环节，明确这是最主要的发展重点，我觉得十分必要，必须强调，“六五”国民经济的发展除了环绕消费品生产外，必须围绕现有工业技术改造来安排，我觉得这是在拟订“六五”计划中亟待切实解决的

一个问题。

3. 关于利用社会资金问题。最近关于资金问题的讨论中，明确了几个问题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随着体制改革、资金分配发生了变化，国家的、中央的预算内的资金相对减少了，下面的、预算外的社会上的资金相对多了。这种现象应该肯定，不应该否定，是一个积极的现象，不是一个消极的现象。因为它有利于调动积极性，有利于生财，而生财是聚财用财的前提。1979年冬我们到匈牙利去考察体制改革，也碰到这个问题，他们的国家预算与企业收入是70:30，国家投资与企业投资是50:50。当时还有另一个代表团，两个代表团的某些成员对匈牙利权下放有不同的认识，一个代表团的同志认为匈的做法是“民富国穷”，另一个代表团的同志认为匈的做法是“百姓足，君孰于不足”。我们是持后一观点的。但是资金权力下放有一个限度，下面钱多了，虽然对于调动积极性，对生产有好处，但也不能让国家财政、中央财政靠赤字过日子。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在体制改革中统收改分收，但统支却基本未变，中央财政背了一大堆包袱，造成中央财政入不敷出，这是不合理的。北京市统计局关于十个利改税企业的材料说，这些企业改税后，留的利润用不完，但至今国家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仍在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和各种名目给予基建投资和其他形式的大量投资。国家减少收入而开支不减。各省市区财政“分灶吃饭”也是如此，灶是分开了，但仍吃“大锅饭”，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随着财政收入下放，相应地也要把一些补贴和其他开支包干下去，同时要保证国家必不可少的开支，这才是合理的。

最近讨论明确的另一个问题是，建设不能光靠国家财政资金，而更要注意充分利用社会资金，即地方、企业和个人手里的钱。这一点也是与过去不同的。对于社会资金的潜力，一方面要